

政治伦理价值论

朱玉福, 谭玉兰

(广州工商学院 思政部, 广州 510850)

摘要:政治伦理是一种应用伦理,是关于政治的伦理,既是伦理,也是政治,是治国之道,为官之道,做人之道。政治伦理是政治文明建设的理论基础和基本价值遵循,其存有的学理价值主要体现在应用伦理学的理论基础、绵延发展的历史思想渊源、和谐社会建设的价值取向以及重在滋养官德生成与发展的实践关怀等方面。

关键词:应用伦理;政治伦理;学理价值;官德

中图分类号:D0-05;B8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021(2017)02-0001-06

人们早已预言,伦理学是 21 世纪的“显学”,而政治伦理学是“显学中的显学”,越来越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我国虽然是一个伦理古国,但是真正意义上的政治伦理研究起步于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之初,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才得以较快发展。近年来学者就政治伦理学研究的重要意义、执政能力与治理体系、社会正义与和谐社会、廉政建设、政治伦理历史资源等问题展开学术探讨和交流,达成诸多共识:加强政治伦理建设,有利于为加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提供价值引导,有利于落实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基本方略,有利于提高公民道德素质,特别是执政者的道德素质,推进社会主义官德建设。

政治伦理不仅是政治文明建设的理论基础,也是政治文明建设的基本价值目标,因此,新时期进一步加强社会主义政治伦理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基于此,本文从政治伦理视域入手,以历史的理论思想和现实发展需要为视角,开辟从实然到应然的路径,阐释政治伦理的学理基础,探寻其思想渊源,分析其现代价值取向,重点落脚于官德的理论与实践滋养,丰富和拓展政治伦理的现代视域,为现代中国政治文明建设,提供政治伦理视角的方法论借鉴。

一、政治伦理的学理之基

政治伦理是一种应用伦理。21 世纪是伦理学复

兴和应用伦理学快速发展的世纪。应用伦理学勃兴于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西方,其影响力早已波及全球许多民族国家,当然也包括中国在内。应用伦理学是研究如何运用伦理学的普遍道德原则和规范去分析解决具体的、有争论的道德问题的学问。在伦理学的基本理论中,道德原则居于核心地位。正确处理个人与集体的关系问题,以及对该问题的解决方式和解决结果,即在个人与集体关系方面秉持的基本原则和立场,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伦理学的前途和命运。尽管较之于传统规范伦理学,应用伦理学的理论体系与原则规范尚在建构之中,可是,就其直接关注现实、关注具体道德问题的特质而言,它毕竟不同于传统伦理学,已经在发挥其独特的功能和效用。实践变化的客观需要,以及伦理学与政治学、经济学、医学、管理学等诸具体科学的不断耦合,必将催生应用伦理学理论的渐趋成熟和实用,使其在有争议的现实道德问题上最终能够达成一定伦理共同体内的道德共识。

政治伦理是关于政治的伦理。对于政治伦理的定义,学界和理论界的传统看法是,政治伦理是指政治主体(阶级、政党和个人)在政治活动中所信奉和实践的伦理精神。^[1]由是,政治伦理涵括政治家伦理、公务员伦理、公民道德、制度伦理等方面,概括起来主要包括个人德性伦理和制度伦理两个层面。然而传统政治伦理的定义尚欠周延,它忽视

收稿日期:2017-02-14

作者简介:朱玉福(1970-),男,安徽六安人,副教授,硕士。研究方向:思想道德教育。

了社会道德规范在政治伦理构建中的重要作用。政治伦理仅靠个人的自信、自省,以及纯粹的制度架构,没有社会公认的道德准则监督约束,就起不到应有的范导作用。个人自信、自省往往仅能做到独善其身,因而并不能直接影响社会;制度又常常由于脱离实际而落后于现实。因此,构建并遵循一套得到绝大多数人信奉的社会道德规范体系,对于提升个人德性修养,推进制度伦理建设,进而加强政治道德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其实,制度也是一种规范,是一种制度化了的、具有一定强制力的行为规范。由此,政治伦理应涵括个人德性伦理、社会规范伦理以及制度伦理等诸方面内容,是各种政治主体在其政治活动中秉持的德性伦理精神和遵循的道德规范体系。政治伦理的功能在于它可以作用于社会制度的选择和评估,提供社会诉求和利益集团的合法性依据,树立官员的服务观念和政治信仰,促成公众意识和公民道德的养成。作为应用伦理学范畴的政治伦理并不仅仅刻意探寻政治主体的动机是否道德,而是主要考察他们的政治活动、政治行为所表现出的道德价值,即政治权威的形塑和政治权力的规范运作。

二、政治伦理的思想之源

对政治伦理的研究,自古以来就受到政治学家和伦理学家的关注。在古代,所谓伦理,笼统的含义就是治国之道,为人之理。如古希腊思想家柏拉图的《理想国》、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我国古代思想家孔子的《论语》等,讲的既是伦理,也是政治;既是治国之道,也是为官之道,做人之道。政治伦理是政治文明建设的理论基础,也是政治文明建设的基本价值遵循。

政治伦理思想,从其肇始至今已有一千余年历史。西方古典政治伦理观曾占据着古希腊政治思想的主导地位,并且对日后政治思想的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伦理与政治,自古以来就一直相互纠缠着。20世纪行为主义和实证主义等思潮的兴起,使价值于是出现分离,曾一度在社会科学领域取得了压倒性的优势。自此政治研究对价值的偏离成为常态,直接导致政治与伦理被强行分离。但是,事实上价值中立难以得到真正实现,终究无法回避在诸多事实面前所必须做出价值选择。20世纪出现了法西斯主义和各种各样的极权主义,具有现实

关怀的学者把这视为当今世界政治危机的标志,从而主张重新从价值合理性,也就是政治哲学的角度来诊治这一危机,由此带来了政治哲学的复兴。^{[1]98}

政治伦理学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历程。20世纪六七十年代是政治伦理研究重新受到高度关注的重大转折点。这一时期,在理论上出现了对行为主义政治学的否定,以及规范政治学的复兴,以1971年出版的罗尔斯的《正义论》为主要标志。《正义论》的出版打破了政治哲学和政治伦理学长久以来的沉寂,在西方政治学和伦理学领域引起了前所未有的轰动,重新恢复了政治学和伦理学的传统方法论。在实践上,1972年美国“水门事件”的曝光,以及西方国家现实政治中出现的诸多伦理问题,如渎职、以权谋私、肆意违法乱纪等,重新唤起人们对政治伦理的关注。

中国作为一个注重礼仪的文明古国,实行了绵延三千多年的伦理政治,产生了浩瀚丰富的政治伦理思想。由孔子、孟子、荀子、董仲舒等重要思想家倡导和不断丰富完善的政治伦理思想深深地融入伦理政治的现实土壤之中,使传统政治与伦理同构同化,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伦理政治和政治伦理。时至今日,传统伦理政治由于其封建性糟粕注定要被现代法理政治所取代,但是传统政治伦理的合理性精髓,尤其是其蕴含的爱国、忠公、诚信、清廉、担当、民本、和谐等政治伦理思想,构成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化育为民族精神的重要滋养,和马克思主义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改革开放时代创新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一起共同构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凝练升华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构筑社会主义政治伦理和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内容。

三、政治伦理的价值之向

政治伦理涵摄政治和伦理两个概念,涉及政治学和伦理学两门学科。因此,对两者的不同偏好,形成了人们对政治伦理研究的两种不同致思取向:其一是以政治学视角关注伦理,表现为政治的伦理。这种政治伦理研究为政治学研究提供一种新的分析框架,为政治研究提供一种体察社会政治现象和政治问题的系统化的伦理观点,产生一组彼此关联的赋有伦理意味的政治学概念和论题。其二是从伦理学的视角关注政治,表现为一种伦理的政

治。这种政治伦理通过伦理学为政治学提供目标、方向和方法,试图把伦理精神转化为一种政治理念和政治规范,在政治理论、政治实践、政治行为中体现伦理追求和伦理规范。

综观政治伦理的致思取向,可以明晰地界定政治伦理的主要研究视域和价值取向。具体表现在四个层面:一是政治伦理价值观。政治伦理价值观是政治生活的价值基础,对现实政治生活中人们的政治行为具有深层次的导向作用。美国政治学家亚伯拉罕·卡普兰在其《美国人的伦理观和公共政策》一书如是阐述:“道德领域包含对自我和他人的个性评价,其范围广泛到包括所有与人的精神价值有关的所有活动——即是说,广泛到人们所做的一切。政治道德不仅仅是行贿和贪污腐化、欺诈和收买或其缺陷的问题,它不是平民出任公职经常假公济私的问题,它存在于所有政策之中,这些政策的决定明显影响着人们对各种事物的价值观。”^[1]¹⁰¹二是政治行为的道德准则。这些道德准则规范着人们的政治行为,是政治伦理价值观的具体化。政治伦理主要涉及社会政治关系中具有伦理道德性质的问题,为解决政治关系中的各种矛盾,提供伦理道德上的理论根据和基本原则;同时,在对政治伦理关系正确认识的基础上,为政治家们在处理政治矛盾的过程中,主要在行使政治权力的过程中,确立正确的道德原则和道德规范。因此,政治伦理就成为人们在政治生活中以一定的阶级道德和社会道德调整人与人之间政治关系的道德准则。三是政治行为主体的道德品质。政治行为主体是指参与或进行政治活动的个人或组织。政治伦理价值观和道德准则只有通过政治行为主体,特别是各级官员的道德内化,才能转化为主体应该具有的道德品质。政治伦理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指统治者本身的道德要求和具有道德形式的统治策略和方法。四是政治伦理反思性和批判性的方法论。政治伦理作为应用伦理之一种,应当依凭政治伦理价值观和道德原则规范对现实政治行为和政治活动进行价值判断和评价,并且批判地考察人们关于政治的种种观念和行爲,把政治伦理作为人类政治最高层次的方法论,指导和规范人们的政治活动和政治行为。

政治伦理关涉着社会的和谐发展。社会的有

序运行与和谐发展一直是人类孜孜以求的理想和目标,然而时至今日,世界范围内的诸种不和谐因素大量存在,已经影响着人类的和谐共生和社会的良性运行。我国经历了近30多年的改革发展之后,尽管经济得到较快速度的发展,物质总量得到较大提升,但是伴随经济较高速度的发展,社会出现较严重的公正问题、贫富悬殊、两极分化、官员懒政和腐败等不和谐因素。社会的不和谐音符如果得不到及时调适,势必会最终影响谱写整个社会全面进步的大乐章。社会的和谐发展,需要构建与之相适应的政治伦理。社会的和谐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政治伦理问题。在任何时期和条件下,政治伦理对于社会的和谐发展都具有方向性的作用和意义。

四、政治伦理的实践之质

政治伦理重在滋养官德的生成与发展。官德既是一种职业道德,又是一种政治道德,即政治伦理。尽管用“官”字来指称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公仆已不合时宜,但是“官德”一词从古至今一直存在,已约定俗成,简练易懂,所以仍然为我们所使用。我们现在所言的“官”,指的是在各级党和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军队和人民团体中担任一定职务和从事管理工作的公职人员,即所谓的各级干部,尤其指涉担任领导职务和拥有管理职权的领导干部。对官德的界定有狭义和广义两种。狭义上的官德是指为官者在其领导和管理活动中以及权力运作过程中所展现出的德行素质。这里官德与师德、医德一样,属于职业道德范畴。治民先治吏。我国早在夏朝就有所谓“夙夜惟寅,直哉惟清”的为政清廉思想。西周时在选拔官吏中特别强调道德品行,以“六德”即知、仁、圣、义、中、和及“六行”即孝、友、睦、姻、仁、恤作为选拔官吏的法定标准。^[2]从广义上说,官德不是一般的职业道德,而更是一种政治伦理。由于官员的管理活动与权力运用相伴而行,所以官德与其他职业道德相比有其双重特点。官员作为一个职业道德主体,既要具备职业道德,又要具备作为一个掌权者在权力运用中的权力道德。由此,官德在社会道德体系中处于主导地位,官德的状况很大程度上代表和直接影响着整个社会的道德状况。

中国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具有一份源远流

长的德治传统,而这一份成果首先属于并渊源于古代官德。由于特殊的历史传统和人文背景,早期的中国并没有生成西方完整的政道观,而是由古代官德生长出中国特有的治道理论,并通过治道涵摄和影响政道,形成自己的德治传统。20 世纪 50 年代台湾学者牟宗山先生在其所著的《政道与治道》中指出,中国以往只有治道而无政道,只有吏治而无政治。^[3]在牟先生看来,所谓政道是关于政权的道理,而相应的治道就是治权的道理,就是治理天下之道。这确实是一个不争的历史事实。中国先人缺乏像西方人那样对于“政道”的过多的学术性很强的专门检讨,没有对诸如自由、平等、权力、权利、政治等“政道”概念过多的追问,这是中西文化的两大差异。然而,中国人专注治道,却并没有完全放弃政道,通过官德的精练和实践,在“治道”中包蕴丰富的“政道”思想,这一点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曾经在其《三民主义》中如是分析:我们现在要学欧洲,是要学中国没有的东西;中国没有的东西是科学,不是政治哲学。至于讲到政治哲学的真谛,欧洲人还要求之于中国。中国有什么固有的智识呢?就人生对于国家的观念,中国古时有很好的政治哲学。我们以为欧美的国家,近来很进步,但是说到他们的新文化,还不如我们政治哲学的完全。中国有一段最有系统的政治哲学,在外国的大政治家还没有见到,还没有说到那样清楚的,就是《大学》中所说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那一段话。把一个人从内发扬到外,由一个人的内部做起,推到平天下止。像这样精微的理论,无论外国什么政治哲学家都没有见到,都没有说出。这就是我们政治哲学的智识中独有的宝贝,是应该要保存的。^[4]

从牟宗山和孙中山对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中有关“政道”和“治道”的不同视角的解辩里,我们可以得出明晰的结语:传统的“治道”实质就是官德,而官德就是政治伦理。只是牟氏的中国传统政治伦理观中有“治理”而无“政理”,孙公的政治伦理视野下“政在治中”,这对于我们今天加强政治伦理研究,推进官德建设无疑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当今的中国政治伦理,其理论致思取向和研究视域日渐广阔,涵括了传统伦理的“政道”和“治道”,官德意蕴也更加深厚而新颖。中国源远流长的德治传统

中,产生了浩瀚丰富的官德思想,居官有德,为政以德,德外无治,是中国古代官德的基本价值理念。

中国“官德”渊源于西周的“敬德保民”和“以德配天”的思想之中。“德”的概念和思想作为一个重要论题被提出来,是从周朝开始的。周武王利用商朝内乱发动伐纣战争,灭商建周。商亡周兴,引发了周朝统治者对于治国方略的深入思考。商朝统治者自称是“上天”在人间的代表,认为其统治可以万世不易,然而奴隶的暴动和革命却使商王朝顷刻间土崩瓦解,“天命改降在周”,其原因只能是统治的安稳如何不在于“上帝”和“天”,而在于民心的向背。于是,周初统治者,特别是武王之后的周公旦,提出了“皇天无亲,唯德是辅。民心无常,惟惠之怀”的思想。^{[2]31}这里的“德”也即统治者的“官德”,被周公提到了治国安邦的高度,“以德配天”“敬德保民”,遂成为治国的重要方略。

传统的官德思想形成于春秋战国时期。发端于西周尚德的思想萌芽,在春秋战国众多思想家里,特别是儒家那里得到最大程度的倡导,并进一步发展成为系统的官德思想。春秋时期的思想家们继承了周代的敬德保民思想,对道德在治理国家中的作用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孔子对前人的重德思想做了进一步的发挥,提出了“仁政”的官德思想。孔子认为“为政以德,譬如此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孔子希望为政者不仅要施行仁政,而且还要为天下做榜样,“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2]32}孟子是继孔子之后又一位儒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其“民本”学说更使传统官德思想理论化、系统化。孟子继承了孔子的官德思想,并做了进一步的补充和发挥,提出“民为邦本”的思想。孟子认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2]32}他看到了民心向背对于国之兴亡、政之盛衰的决定性作用,为政者如果施政于民,人民就会归顺,反之,“夺其民时,使不得耕耨以养其父母,父母冻饿,兄弟妻子离散”和“彼陷溺其民”,^{[2]32}就会丧失民心,得不到人民的拥护。孟子的“民本”思想,后来被荀子表述为“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2]32}这一思想也为以后统治者和有识政治家加强自身修养以及治国兴邦的警世良言和指导思想。

在西方传统伦理思想和政治思想的发展历程中,虽然没有形成像中国传统官德思想那样系统的

官德理论体系,但是仍然产生出一些灿烂的官德思想。西方早期古希腊苏格拉底的贤人政治,柏拉图的“哲学王”统治,以及亚里士多德的公正理念和法治思想,为近现代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建立和发展提供了不竭的思想源泉。

古希腊是西方传统政治文明的发祥地,孕育了古典形态的官德思想。以雅典岛为中心的古希腊是由一些城邦组成的国家,城邦是一种特殊的政治组织形态,其政治本质是自由公民的自治团体,因此城邦中伦理和政治具有高度的同一性,几乎所有的政治共同体成员都能够直接参与政治活动。正是在这种扁平状的城邦政治结构中,孕育了古希腊乃至整个西方原始的民主、自由和法治思想。^[5]而正是在这种开放性的民主自由的政治环境中,古希腊的先哲们为了获得智慧和追求真理,开始了对人的智慧和道德的关注,形成了重要的官德思想。

苏格拉底堪称西方伦理思想的先声,在其伦理思想和政治哲学思想中渗透出他的官德思想。苏格拉底一生致力于探讨和追求真理之中。他认为“知识即善”,要追求真理,人们必须具备三项素质,即“知识、善良和诚实”,^{[5]60}正义观构成苏格拉底政治哲学的核心,在此基点上他提出了贤人政治的政治主张。苏格拉底认为城邦统治者应当由德才兼备、知识超凡的贤人担当,政治家必须具备灵魂向善的哲学修养,广博的从政知识,以及谙熟治国之道,同时,执政者要接受教育,学习包括军事、财经在内的各种知识,具有自制、正义的美德和吃苦耐劳的品质。

作为苏格拉底哲学传人的柏拉图,认为人的品德是政治的基础,人的品性堕落会导致社会秩序的混乱。柏拉图把人分成三个等级,并分别对他们提出相应的道德要求:统治者——具有智慧,保卫者——承担勇敢,生产者——懂得节制。政治统治的基本目的是保持公民的完美品行而不致堕落,这个任务不可能靠法律完成,而只能依赖于少数智力非凡、品德超群的人,即所谓“哲学王”的统治才能完成。

亚里士多德是继苏格拉底、柏拉图之后古希腊政治、伦理思想的集大成者。如果说苏格拉底、柏拉图的官德思想尚属于人治的范畴,那么亚里士多德则从人治思想向法治思想迈出了关键的一步,开

创了人类民主法治思想之先河。亚翁认为伦理学的主题是根据人们自然向善的本性,探讨如何使人们过上良善的生活,其基本途径有两种,第一种是依靠公民个人的修养,第二种是依靠法制,即政治上的立法和执法。亚里士多德强调政治学首先要搞清楚什么是善,什么是德性,这又是伦理学的研究范围,于是亚里士多德认为伦理学是政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亚里士多德认为城邦与个人的目的都是追求公正的美德,而公正的实现和美德的培育有赖于立法和执法。^{[5]64}亚里士多德提出“人在本性上是政治的动物”口号,^[6]倡导建立公民轮流执政的民主政体。他认为统治者必须习知如何受人统治,统治者必须做到公正和节制,具备完全符合中道标准和体现圆满理性的品质,同时要足智多谋,懂得立法并模范遵守法律,能“辨别真理”和“明哲端谨”。^{[6]43}

严格意义而言,“官德”一词早已成为历史,我们现在之所以仍然用之,只是借其外壳,其内核已经焕然一新了。现代意义上的官德与传统官德是截然不同的。在传统社会中,官德思想作为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维护的是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其所谓的民本理念并不能真正体现广大劳动人民的意志,实际上是以统治阶级的利益为本。传统“民本”思想视域下的官德与“以人为本”“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价值理念的现代官德不能同日而语。构成社会主义政治伦理和政治文明重要内涵的现代官德,适应现代法理政治而存在,是与传统伦理政治彻底解构的。我们应在现代民主法治建设的视域下,全面落实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把现代官德与传统官德进行彻底扬弃,不能拖着封建主义的尾巴来搞社会主义建设。因此,现代官德从政治伦理的研究汲取滋养和方法,借鉴传统官德的有益养分,着力开显公民价值,构建现代公民法治社会,倡导民主、平等、自由、参与的公民社会价值理念,践行为民、勤政、担当、清廉的为人民服务的共产主义政治信仰。“官德”与诸如“公仆”“群众”“老百姓”“干部”“领导”等传统词汇一样,应当赋予时代的新义,真正做到“主”与“仆”民主,“官”与“民”平等,“干”与“群”和谐。

官德即政治伦理。开展政治伦理视野下官德的应用研究,其重要性在于立足社会转型期的伦理

断层和道德失范之现实,打破传统官本位思想,彰显官德在政治伦理中的示范和导向作用。切实推进官德建设,有助于坚定党的执政理念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有助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有效

地预防和惩处腐败、倡导廉政,加强民主法治建设,建立一个公平正义、民主法治的和谐社会。提高官德修养,加强官德建设,成为新时期廉政文化和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

参考文献:

- [1] 甘绍平,叶敬德.中国应用伦理学(2002)[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12.
- [2] 朱贻庭.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史[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31.
- [3] 牟宗三.政道与治道[M].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0:25.
- [4] 孙中山.三民主义[M].长沙:岳麓书社,2002:18-19.
- [5] 宋希仁.西方伦理思想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59.
- [6]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上海:商务印书馆,1996:42.

On the Value of Political Ethics

ZHU Yu-fu, Tan Yu-la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Department, Guangzhou College of Technology and Business,
Guangzhou 510850, China)

Abstract: Political ethics is a kind of applied ethics. It is about the political ethics, both ethical, but also politics. It is the way of governing the country, being officials and behaving as a good man. Political ethics is the theoretical basis and basic value of polit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The theoretical value of its existence is mainly embodied in the theoretical basis of applied ethics, the origin of lasting historical thoughts, the historical origin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harmonious society, the value orientation of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the harmonious society and the practical care of the gen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official morals, etc..

Key words: applied ethics; political ethics; scientific value; official morals

[责任编辑 李潜生]